

# 中共滲透新聞界的故事

鄭竹園

世界各國共產黨，在進行武裝叛亂、暴力奪權之同時，有一項重要的工作，就是對自由體制下的新聞傳播界進行滲透。第八十七屆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，曾為此進行調查。其中關於中國部份的分析，係由在美任教的名教授鄭竹園博士主持；鄭氏所提之研究報告，題為「中共自一九二七年至四九年期間，對大陸新聞界之滲透」。

當中共目前正在加緊對我展開統戰之時，本於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」之義，本刊將此報告轉載，以提高海內外同胞之警惕。（編者識）

## 前 言

共黨利用統戰和武裝鬥爭作為奪取政權的兩種主要手段。在展開一項統戰行動時，宣傳是共黨的最重要武器。報紙、雜誌和各種文學刊物，被視為主要的宣傳媒體，因而在奪取政權的整個戰略中，共黨予以高度重視。一如列寧所說：「報紙不僅是集體宣傳者與煽動者，它也是集體組織者。」中共在其奪取政權的陰謀中，并不把宣傳活動限於報章雜誌，也擴展到文藝方面。一九四二年五月，毛澤東綜述中共的宣傳工作時曾說：

「在我們解放中國人民的鬥爭中，有各種的戰線可以利用，其中兩種可以提出來討論：一是

文的戰線，一是武的戰線，亦即文化戰線與軍事戰線。爲打敗敵人，我們得主要依靠手裏拿着槍的軍隊，但這還不夠，我們也需要一支文化隊伍。爲團結我們本身，和打敗敵人，一支文化部隊是絕對不能缺少的。」

毛澤東主張中共應利用各種手段，「使藝術與文學配合整個革命機器，使之成爲這部機器的零件；使之成爲團結與教育人民、攻擊與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。」於是，中共採用了這種基本戰略，在國民政府控制的地區充分利用新聞界，以騙取各階層的支持。

大體上說，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佔據中國大陸之前，曾被禁止從事政治活動。因此他們主要是靠向國民黨辦的報刊及中立性的報刊滲透。中共爲達滲透目的，就派出得力的幹部，到那些報刊中取得編輯或記者的職位；他先把有影響力的中立報刊的負責人騙進左傾陣線，然後再把他們拉進共黨同路人的圈子內。

中共人員滲入非國民黨辦的報刊，產生了巨大的效果。這不僅使共黨能將其劣勢地位轉爲優勢，也終於對後日的竊據大陸有助。

共黨這種滲透活動（也就是它的基本戰略），其過程與在各種態勢中所採用的戰術，至今仍有重大意義。這個故事，對於仍然自由，但共黨的滲透已對其民主制度構成真正威脅的國家，可說是一個歷史教訓。

一九二七年中國國民黨開始進行全面清黨，以便把共黨分子逐出政界，自那年以後的二十二年當中，共黨滲透與利用非共新聞界的基本戰略，大致可分爲二個階段。

## 壹 滲透新聞界為基本戰略

第一個階段在一九二七年開始，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。這個階段是間接滲透時期。共黨因遭受連串的軍事挫敗，被迫作所謂「二萬五千里（約五千英里）長征」，從江西逃往延安。此後共黨在國民政府地區的一切活動即轉入地下。在極為不利的環境下，中共採用毛澤東的方法，利用文藝運動來掩飾他們的政治活動。在文化與經濟中心的上海，出現了很多文學組織，他們首先集中翻譯介紹馬列主義，和文學及科學方面的理論，以便在中國知識份子中散播共黨的觀念。次一步驟是組織一種統一戰線。左翼作家聯盟於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在上海成立，它對於年輕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發生了廣泛的影響。被中共譽為「中國高爾基」的魯迅，當選為「左聯」的主席。但事實上，這個組織是由其秘書長周揚把持。周揚是共黨在上海的一名地下活動分子，後任中共「中央委員會宣傳部副部長」。後又成立了左派「文化工作者全國聯合會」，以擴展共黨的勢力。這個「聯合會」包括「左翼作家聯盟」，「社會科學家聯盟」、「劇作家聯盟」和「新聞工作者聯盟」等。「聯合會」及其附屬組織假裝從事文化活動，實際上乃是共黨在每一方面施行顛覆陰謀的武器。

那時國民政府的軍事行動非常積極有力，共軍已瀕被全面消滅的邊緣。於是在國民政府控制地區中的共黨「文化軍」便發動反擊。共黨的宣傳人員把握了中國人民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瀋陽

事變後所產生的高昂反日情緒，公開譴責國民政府向日本的侵略屈服。反日的呼籲除了爭取到知識分子參加左派陣線外，也造成一時的輿論，主張國民政府放棄對共黨的軍事圍剿。一九三六年，共黨企圖迫使國民黨停止完全消滅共黨武裝部隊的行動，遂有西安事件的發生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戰爭爆發，共黨進行滲透活動的新時期也由此開始。共黨以全民抗日統一戰線之名，又開始進行滲透活動。一九三八年春，國民政府在軍事委員會之下成立政治部。這個新機構的成立，是為對日本侵略者從事政治文化鬥爭，由陳誠將軍主持，以周恩來副之。後任中共「科學院長」的老資格左派作家郭沫若任該部第三廳長，負責宣傳事務。這個機構以後成了所有從上海撤退的左派作家、藝術工作者、演員，及在國民政府控制地區從事地下活動的共黨人員的據點，分別從那裏展開三項重要的顛覆活動。

第一、這個由共黨滲入的組織，能使共黨分子以合法的外衣掩飾其非法的行爲。共黨分子假全國抗日之名，滲入了各種官方與民間的宣傳機構，又再從內部顛覆這些機構。

第二、共黨分子以文化活動爲名，向學校積極滲透，煽惑教授與學生，逐漸擴大了左派陣線。

第三、共產黨藉滲透與挑撥，竟能把右派人士加以區分，最後把他們孤立起來。

爲了穩固左派陣營，共黨在中國戰時首都重慶成立了三個新機構，其中包括「文藝工作者協會」、由郭沫若和茅盾領導（茅盾後來擔任中共的「文化部長」）；「新聞工作者協會」，由范長江領導（范某爲中共新聞工作方面的重要分子）；和「音樂戲劇工作者協會」，由田漢領導（

田漢後任中共政權的藝術部門首腦）。他們的活動地區，從重慶伸延到西南的昆明，和西北方的蘭州，目的是爲中共在最後階段鬥爭中得逞而鋪路。

中日戰爭結束後，國民黨與共黨間的戰爭立即展開。共黨分子已滲透在政府區，所以他們已不在文藝的掩飾下活動，改而直接向中立的報刊進行顛覆滲透。中共在這段時期可採用的策略爲：①在人民大衆中散播「反內戰」的情緒，以削弱國民政府的聲望。②公開揭露國民黨的軍事機密，以動搖軍心。③煽惑學生去鼓勵罷工與示威。誇張報導國民黨控制地區生活之艱苦，以之與共黨所佔地區中的所謂「美好情況」比較，騙取人民的同情與支持。中共採用這些手段不僅破壞政府區的社會秩序，也使國民政府軍隊在心理上受失敗主義的影響，因而造成在若干戰區的失利。

## 貳 直接滲透有影響力報刊

在向報刊滲透的過程中，共黨所採取的戰術視階段與環境而異。其基本的手段，是採取間接的途徑，即動員左派作家爲國民黨創辦的與中立的報紙寫文章、評論、畫漫畫。更重要的是直接滲入一些有影響力的報紙，以及作爲共黨的講台。

間接手段在中日戰爭期間就已廣泛利用。中共動員了許許多左派作家，去編輯刊物，及爲上海一些非共報刊撰寫社論。例如，十多名老資格的共黨作家，包括王任叔（一九五〇—五四期

間任中共駐印尼「大使」）和梅益（一九四九年後擔任「廣播事業管理局長」）即定期為大英晚報、華晨報等非共報紙，和兩家銷路廣大的報紙「申報」和「新聞報」撰寫社論。王任叔（筆名巴人）還曾編輯「自由談」，那是申報著名的文藝副刊。梅益和其他共黨幹部定期為「神洲日報」寫社論，那些人所寫的文章，當然都是左傾的。

中共在內戰後期所採用的直接滲透手段，包括兩項主要的戰術：①派遣訓練最好的幹部去最有影響力的報刊當編輯和記者。②收買那些新聞機構的主要負責人。中日戰爭後，中共這種滲透活動的最顯著成就，是向三家有影響力的報刊滲透，那就是「大公報」（該報有重慶、上海、天津和香港等版），上海的「觀察」週刊，和南京的「新民報」。

大公報是私人辦的一份報紙，一九〇二年在上海創刊。一九二六到一九四九期間，它是中國最具權威性的報紙。大公報在政治事務上保持中間路線，社論受到廣泛尊敬，對於受高等教育的人們有着極大的影響力。中日戰爭末期，中共很技巧的在大公報的編採人員中安插了很多年輕的記者與編輯。這些受過中共精密訓練、有高度技巧的幹部，在國民黨控制地區竟也受到廣泛的信任，為大公報的戰地記者之一范長江，實際上是共黨的地下活動分子。大公報另一著名的女記者彭子岡，自一九三三年便是共產黨員。這家具影響力報紙的數名編輯，包括蕭軍、徐盈（彭子岡的丈夫）都是共黨特務。范長江的共黨黨員身份保密了多年，但他終因顯有左傾思想，而被大公報免職。一九四九年中共「獲勝」後，范長江立即擔任中共「新聞總署署長」，後來他擔任「國務院」「科技委員會」的「副主任」。這是一個很高的職位，要有共黨黨籍的人才能擔任。根據中

共的紀錄，一九四七年，大公報重慶分社就有八名編輯和記者，因被發現爲共黨工作，而被國民政府逮捕。

### 參 派出特務份子滲透報社

一九四八年，共黨向大公報的滲透活動已及於其領導人員。當時國民政府仍控制南京和上海，中共竟透過其地下活動分子，邀請大公報的總編輯王芸生到共黨控制地區去參加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」。

一九四八年秋，王芸生秘密離開上海，途經香港進入中共控制地區。從那時起，這家有影響力的報紙實際上已被中共控制了。

「觀察」是一份週刊，其內容以論時政爲主，由一些知識分子創辦，其中多是大學教授。這個刊物於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在上海創刊，不久即在知識分子中獲得許多讀者。在其高峯時，曾發行一〇五、〇〇〇份。讀者中有大學學生、政府官員、工商人士、教授和軍事將領。這份刊物的主持人儲安平，表面上，似乎是開明的民主人士，實際上却由上海的共黨活動分子操縱。「觀察」的主要特色，是刊載其在各大城市的記者所寫的文章，尤其是其它駐南京的記者們所寫的軍事分析。在內戰的末期，中共動員其地下人員，爲「觀察」充當記者，同時這家週刊也開始刊登揭露國民黨軍事機密的文章。由於當時的軍事發展多如「觀察」的分析所預言，所以在一九四七

一四八年期間，這家刊物被視為一份權威刊物。據「觀察」的負責人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所寫的調查報告，那時它的記者已在南京、北平、天津、西安、漢口、成都、昆明、烏魯木齊和蘭州從事秘密工作。單是在南京就有八名這種記者，其中四人專門蒐集揭露國民政府的軍事機密。它的一些記者竟潛伏在國防部裏。這些記者所寫的報導，除了揭露軍事機密外，都是描繪「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黑暗與邪惡」。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國民政府內政部決定禁止該刊發行時，這家被共黨滲透的刊物已達成了破壞民心士氣，使中共獲利的任務。

### 肆 美人計煽惑發行人左傾

共黨向新聞界滲透的另一個例子，是南京「新民報」的變節。中共為了使這家擁護國民黨由私人創辦的報紙，變成一個替共黨宣傳的媒體，就派了頗具姿色而且精幹的女記者龔澎到那家報社去。龔澎跟該報發行人的妻子鄧某建立了親密的關係，逐漸煽惑該報向左轉，最後終於把它變成了共黨的另一個宣傳工具。共黨「勝利」後，龔澎立即被任為中共政權「外交部新聞司司長」，以謝其滲透新民報的「功勞」。

共黨對新聞界的滲透活動，得到了很大的利益。據一九五七年公布的共黨資料，一九四六年上半年，在北平、南京、上海和重慶四個城市，有一百多家報紙雜誌被中共分子滲入，後由國民

政府當局查封。這個數字說明了中共在他們的「勝利前夕」，向新聞界的滲透真是無所不用其極。

中共向新聞界的長期廣泛滲透，為共黨的佔據大陸至少產生了四項效用：

第一、中共藉着非共報紙，充分利用當時的情勢，在每一階段造成「有利」的輿論。一九三一年，中共利用高昂的反日情緒，譴責國民政府的軍事行動，因而使中共在國民政府的軍事圍剿中，獲得了喘息的時間。一九三七年後，先利用全國對抗共同敵人日本的運動，滲入國民黨宣傳部門的每一方面。一九四五後，它充分利用反內戰情緒，爭取中國知識分子的同情與支持，若無對非共新聞界的滲透，中共廣泛的宣傳計畫就無從有效推行。

第二、中共藉着對非共新聞界的滲透，騙取知識分子的廣泛支持，因此孤立了國民政府。

第三、藉着揭露國民政府的軍事機密，和大量宣傳國民黨的弱點，中共破壞了國民政府軍隊的士氣。

第四、中共利用非共報刊，在全世界製造了連串的假象，他們偽裝成爲「民主的土地改革者」，與莫斯科無密切關係，因此獲得西方相當大的同情。

中國大陸之淪於共黨之手，當然不能歸因於任一單一的因素。但共黨向非共報刊滲透，將其變爲替他們宣傳的機器，乃是一個重要的因素。這是從內部瓦解敵人，爲最後的「征服」鋪路的最有效武器之一。（原刊中央日報）

